

美国少数民族传媒理论研究的进展及缺陷^{*}

彭伟步

内容提要 作为传播族群文化的工具,少数民族传媒在维系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学者研究少数民族的认同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入点。许多美国学者采用民族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大量的交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肯定了少数民族传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采取本土化的手段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的策略,提出了其为加强与主流社会的交流必须再编码和再传播的观点,并认为双重认同的特点并不妨碍其在政治上认同美国,有助于本族群融入主流社会。但也存在意识形态浓郁,对新闻传播规律缺乏了解,以及因为语言障碍而无法实现多种媒体纵横向比较研究等缺陷。

关键词 美国 少数民族 传媒理论 族群和国家认同 研究缺陷

美国是由多族群构成的国家,如何归化不同种族群体,贯彻美国价值观,成为政府的重要议题。19世纪以来,随着外来移民不断增多,美国境内的种族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再加上政治选举的推动,少数民族日益对自身的权益提出各种诉求,迫使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关注此一领域的研究。作为反映少数民族的诉求、承传族群文化的喉舌,美国少数民族传媒在复杂的政治关系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拥有重构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间关系的影响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鉴于境内大量出现的少数民族传媒及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许多美国学者通过研究少数民族传媒,探讨美国的种族社会学,由此开辟了民族学的一个新研究领域。本文以美国少数民族传媒为切入点,阐述美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希望为学界了解少数民族传媒的理论建构和开拓民族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一个窗口。

一、美国少数民族传媒理论研究的背景

在移民国家,少数民族传媒既是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工具,也是加强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和促进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重要手段。

美国是一个由多种族、多族群构成的移民国家。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一人出生在外国,共有2840万人,占美国人口的11%,此外还有1480万人的父母双方出生在外国,1270万人有一方父母是出生在外国,三者加起来共有5600万人具有外国血统,占美国总人口的20%,而30年前这个数字是3400万,创了历史最高”。^①“这些移民或移民的后代主要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新泽西州和伊利诺伊州,占总数的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课题“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项目批准号:10J2D0049)子课题“海外华文媒体在建设中国软实力中的作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美中文化交流中心《美国介绍》,2010年8月2日,载<http://www.accec.org/html/meizhongshangwu/gongwuchufang/20100802/76.html>。2000年的人口普查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普查活动,数据较2010年更为翔实,故本文采用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70.4% ,其中加利福尼亚州人口中 25.9% 的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 ,纽约州为 19.6% 。在大城市中 ,洛杉矶市的外国出生的人口占了 29.6% ,纽约市更高达 36.7% 。2007 年 ,美国的种族构成是:白人 80.1%、拉美裔 15.1%、非洲裔 12.8%、亚裔 4.4%、印地安人及阿拉斯加土著民 1.0%、夏威夷土著民及太平洋岛民 0.2%、两个以上种族(具有不同种族血统的人,称为多种族) 1.6%。其中美国黑人、拉美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总人口已达到 1.007 亿人。”^①

另据 2010 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美国的白人正以快于先前预测的速度变成“少数民族”。数据显示,“成年的白种人数量在下降,而 18 岁以下的拉美裔、亚裔和其他少数人种的人口在上升。在全美范围内,67% 的成年人是白种人,但在儿童中白人比例只占 54%”。^② 调查预示,按照 2011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和人口发展趋势,不超过 50 年美国白人将很快变成少数族群。此外,从调查来看,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非常活跃,通婚比例不断提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对族群多元化的接受,也显示了具有“多种族人”身份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多种族人”这个概念的使用,却使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种族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种族、种族关系等相关的问题,由此给民族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多元种族环境。

伴随美国种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性的发展,服务于少数族群的传媒相继诞生,且在现实生活中的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统计,“在美国,有超过 1000 份少数族群报刊,少数族群媒体的触角能渗透到其中的 5100 万人,占全体美国成年人口的 24%。在这 5000 万新闻受众中,2900 万人是少数族群媒体的忠实受众,占美国成年人口的 13%;剩下的 2200 万人,在接受英文或是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时,也会光顾少数族群媒体。”^③ “除非裔族群外,移民们都表示,更愿意通过少数族群媒体获取关于故土或是所在的美国社区的信息。调查显示,西班牙移民对本民族的媒体最忠诚,87% 的人说他们经常接触西班牙语媒体;其它四个少数群体中,也各有 64% 的人收听、收看、或是阅读母语新闻。在网络媒体的受众中,阿拉伯语网站吸引了美国 76% 的本语种移民;亚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陆自己的母语网站了解窗外事。”^④ 可见,少数族群传媒已经成为美国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族群信息的重要工具。

美国多种族背景和政治选举的推动,为少数族群传媒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随着外来移民的流入,以白人为主要构成的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是否接受美国价值观,以及少数族群传媒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忧虑,从而使美国种族构成和美国价值观在少数族群的承传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许多从事民族学和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投身于此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了一系列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著作,如马修·马特萨加尼斯(Matthew D. Matsaganis)的专著《理解族群媒体:生产、消费与社会》等,推进了民族学的研究。^⑤ 在这样的学术土壤上,逐渐形成了建立在人类学、民族学、国际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少数族群传媒理论。

二、少数族群传媒理论的建构

当前,美国学者对少数族群传媒的研究和理论建构,主要吸收了民族学、新闻传播学和国际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美国学者主要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① 美中文化交流中心《美国介绍》,2010年8月2日,载 <http://www.accec.org/html/meizhongshangwu/gongwuchufang/20100802/76.html>。

^② 《美国白人正快速成为“少数民族”》,载《东方早报》,2011年4月9日。

^{③④} 华语国际通讯社《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巨人》,2008年3月4日,载 http://www.cmedu.com/bbs54_58671.html。

^⑤ Matthew D. Matsaganis, *Understanding Ethnic Media: Producers, Consumers, and Societi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May 27, 2010)。

1. 少数民族传媒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在互联网和移民全球化时代,为增强话语权以及提升经营管理的水平,在受众、资本、技术条件兼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传媒已呈现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进行全球传播的趋势,如纽约的中文电视和中文报纸,通过在互联网提供视频、文字和照片信息,不仅面向美国华人传播信息,而且为中国人提供有关美国华人的信息。又如犹太人所创办的希伯来文报纸,不仅面向美国的犹太人,也同时为以色列人提供信息服务。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少数民族传媒的发展,也使得它们呈现出与当地主流传媒、跨国传媒的显著差异。少数民族传媒新的传播态势的出现,为美国研究少数民族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背景,推动了少数民族研究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美国学者西蒙·科特尔(Simon Cottle)通过对来自非洲的黑人少数民族的研究,发现“在全球化、新媒体传播背景下,媒体在传播非洲黑人文化,培养族群归属感起着重要作用,由此提出了‘新族群’的概念,描述了因为媒体的传播全球化,产生虚拟的网络少数民族社区等现象,并发展了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种族主义的理论”。^①

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少数民族传媒的生存空间面临被实力雄厚的传媒集团逐渐蚕食的困境。比如说,鉴于美国华人人数众多、消费力强劲的事实,许多主流传媒集团都不约而同地创办华文传媒,或是在网络上开辟中文版,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少数民族传媒的空间。如美国新闻集团旗下的《华尔街日报》开辟中文版就是其中一例。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趋势,美国学者巴赫·弗雷德里克(Barth Frederik)鼓励少数民族传媒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他认为,“少数民族传媒可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既要实现自身的全球化,也要实现外在的全球化,与美国主流文化对接和融合,才能在美国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实现互动,得到提升,也可以在反西方文化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的过程中,获得展现少数民族文化魅力,扩展文化影响力的机会”;而且“少数民族文化只有融入美国本土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才能获得更大的传播能量,才能获得生存”。^②

从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来说,少数民族传媒的传播全球化已经非常明显。这种现象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少数民族的声音,使更多的人了解到少数民族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少数民族的权益;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使少数民族与祖籍国加强了联系,使得国际政治更加复杂和微妙。如美国以犹太人为传播对象的希伯来文报纸,不仅维系犹太人的文化传承和族群认同,而且大力鼓动犹太人积极参加政治选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政策,由此成为犹太人的舆论喉舌。

基于新媒体的兴起和其全球传播的特点,美国学者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传媒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拓宽了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学者为开拓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少数民族传媒的再编码和再传播。少数民族传媒全球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实现传播全球化;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向不同种族传播。相比较而言,实现第一个层面的全球化要比第二个层面的全球化难度要小得多。由于要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传播,不仅需要雄厚的资本,而且还要进行二度编码和语境的转换,^③导致传播过程复杂化。

由于少数民族传媒向美国主流社会以至全球传播的过程中,要经过文本的二度编码和再传播的阶段,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传媒要通过多种手段,以当地主流语言翻译和传播少数民族的信息,这样必然增加了少数民族传媒全球化传播的难度,反映了少数民族传媒向美国主流社会和西方社会

① Simon Cottle,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Changing Cultural Boundari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

② Barth Frederik,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69, p. 62, 149.

③ 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在《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提出文本的二度编码和再传播问题,并认为中国对外传播要进行语境转换,才能更好地受众,实现有效传播的目的。

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相对艰难的现实,凸现了少数民族传媒弱小的话语权,说明少数民族传媒信息传播“逆差”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美国学者路易斯·卡因卡认为,“在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之所以被认为与恐怖主义有关,根本原因在于在美以及中东阿拉伯文媒体与主流媒体存在差距悬殊的传播力量,导致了整个穆斯林族群被主流媒体刻画成恐怖分子”。^①虽然美国号称全球资讯流通最自由的国家,但是许多法律也对信息的流通设置了许多阻碍,政府可以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对少数民族传媒的信息进行过滤和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下,少数民族传媒的再传播和再编码也必然受到影响。这也是造成少数民族传媒向主流社会和其他族群传播信息难度增加的原因之一。

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资讯的自由传播导致了美国少数民族传媒迅速、持续、跨国界地发展,也导致了少数民族、当地主流社会、西方社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交流互动网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传媒能否实现传播少数民族信息的任务,仍然取决于西方社会对该信息的评价标准和少数民族传媒的效度和信度问题。美国学者埃洛斯·帕安尼能(Eloise Paananen)据此认为,“少数民族传媒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存在严重的不对等问题,这个问题导致了主流媒体在转载少数民族传媒的报道时有意无意地歪曲事实,丑化少数民族形象”。^②

从重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少数民族传媒的报道也许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少数民族形象,集中在一系列关于当地主流社会歧视、不公平对待少数民族的特殊领域,造成美国主流媒体误读少数民族传媒的再传播和再编码现象,严重扭曲了少数民族的形象。比如美国华文传媒指责政府把华人当作间谍,并把此种信息传递到美国主流媒体,然而主流媒体并没有对华文媒体再编码和再传播保持足够的公正性,即使有,也会选择一个负面的角度进行解读。美国学者埃洛斯·帕安尼能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对这些信息再组织和报道之后反而使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误解更加严重,强化了华人不仅在文化上认同中国,而且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的印象,这种情况进一步刻板了华人在美国人的形象”。^③这种现象说明少数民族传媒的全球化所造成的影响虽然能够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但是在强大的主流文化和媒体面前,它们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只能在族群内部或者在政治选举、社会公共议题等特定领域产生影响。

鉴于少数民族传媒的传播特殊性,许多美国学者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少数民族传媒的再编码和再传播对美国社会结构造成的影响,采用内容分析或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对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少数民族新闻的再组织和再传播进行研究,讨论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的社会互动,从中寻找一条洞悉美国少数民族与政府管理以及美国种族关系变化的道路。这种研究视角由于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又有多学科的交叉,目前成为许多美国学者研究少数民族的主要切入点。

3. 少数民族传媒的双重认同。随着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泛国家化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从而导致少数民族传媒形成了族群与国家双重认同的特点。这是因为在民族国家中,当地政府为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在族群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不得不根据少数民族传媒所发出的诉求对政策进行调整,满足少数民族的部分愿望。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传媒的存在,不仅展现了族群是否继续存在的象征意义,而且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文吉认为,“我们期许它不但能为少数民族的权益发声,也应该针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诟病展开反思和批判,而强调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传播的主体性,这非常重要。如果少数民族掌握了媒体,就掌握了族群关系的解释权。如果没有媒体,我们就会被动地落于被别人报道的地位。少数

^① Louise A. Cainkar, *Homeland Insecurity: The Arab American and Muslim American Experience after 9/11*,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January 2011, p. 3.

^{②③} Eloise Paananen and George Tsui, *The Chinese in American*, The Viking Press, 2003, p. 78, 134.

族群传媒对少数民族的报道,对我们(少数民族)形象的改善是有帮助的。我们谈少数民族媒体的主体性,就是掌握我们少数民族媒体的发声权,实现少数民族媒体的主体地位。我觉得主体性的建构关键就在于此。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少数民族自己的记者、制作人来自报我们自己的事情,让社会看到我们少数民族的真实情况。我们要掌握这样一个主体的位置来展现自己,这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所以少数民族媒体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① 孔文吉关于少数民族传媒合理存在和双重认同的观点,反映了少数民族传媒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中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个课题也是许多从事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关注的焦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新移民来到美国。如何使这些新移民特别是德国移民效忠美国,是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着排斥新移民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通过对移民报刊的研究,反对压抑或控制这些报刊。他认为,“移民报刊的角色有助于维护种族文化,并使读者通过族群语言而接触到都会生活,了解当地主流社会,对缓解新移民的思乡情绪,淡化边缘人的色彩,从而顺利地融入美国社会中”。^② 帕克的研究,证明少数民族传媒并不会阻碍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当然也不存在移民不认同所在国家的问题。

在帕克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朱迪斯·布罗(Judith R. Blau)、米姆·托马斯(Mim Thomas)、贝武利·纽豪斯(Beverly Newhouse)、安吉·卡威(Andrew Kavee)等人在《移民报刊:族群缓冲机构,纽约1828—1984年》一文中也对少数移民报刊的文化和国家认同提出了与帕克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这些移民报刊憎恨或拒绝同化(assimilation)。^③ 之后,不断有亚裔、拉丁裔和非裔学者加入此领域的研究,为少数民族传媒的双重认同进行辩护。

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少数民族传媒,总结出如想增强它们对国家的认同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上:一是国家要为少数民族提供某种现实的利益;二是在危机情况下为少数民族的权益提供合适的保护,其正当权利应受到政府的尊重。然而,美国少数民族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压制,而且在政治上也缺乏权利,甚至受到歧视。在危机来临时,少数民族往往成为政客转嫁危机的“替罪羔羊”,这无形中告诉他们:少数民族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争取自身的权益,少数民族传媒只有发出声音,才能反映少数民族的心声。这自然会削弱少数民族传媒鼓励本族群融入主流社会和增强国家认同感的积极性。因此,当少数民族传媒发现国籍的归化只不过是一种“标签”的变化时,它们就会更加主动和鼓励少数民族参政议政,更加注重族群的认同感。

虽然少数民族传媒并不妨碍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反而有助于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作为族群重要的象征符号,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始终受到误解,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它们更有可能被解读成增强族群感、分裂国家的重要工具,并受到政府的严厉压制。许多美国少数族裔学者,为维护本族群的权益,帮助主流社会理解少数民族的政治效忠问题,投身于民族学的研究中,把少数民族传媒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传播内容和议题设置的研究,反映少数民族传媒的文化承传和双重认同功能,以此解释少数民族传媒的特点,缓解主流社会的疑虑,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三、少数民族传媒理论研究的缺陷

不可否认,许多美国学者对少数民族传媒的理论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从研究情况来看,

① 田建明《传媒对台湾少数民族发展至关重要》,载《中国民族报》2006年4月18日。

② R. Park,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Research in Social Servi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1924, pp. 264 - 265.

③ Judith R. Blau, Mim Thomas, Beverly Newhouse, “Andrew Kavee: Ethnic Buffer Institutions - The Immigrant Press: New York City, 1820 - 1984”,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23, no. 3, 1998, pp. 20 - 37.

大多数学者都是以美国的少数族群,如华人、穆斯林、非洲黑人等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少数族群传媒的文化适应和帮助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所发挥的作用。经常用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等实证性研究方法进行量化研究,而缺乏对少数族群进行更深入的访谈和介入性调查,从而导致推导出来的理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语言障碍。学者要想更深入研究少数族群传媒,最好能够掌握多种族群语言,以便于对它们进行纵向和横向研究,然而,这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学者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故此他们对少数族群传媒的研究便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

1. 研究带有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大多数研究都是以美国境内的少数族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传媒如何推动外来移民的文化适应和融入,但是有意无意地从美国价值观角度出发研究少数族群传媒的功能,特别是对亚裔移民及其传媒带有歧视和偏见,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经常反映在学者的研究结果当中,从中反映出美国学者在从事少数族群传媒的研究中,不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均带有浓郁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学者对在美日文传媒怀有相当高的警惕性,有关政府部门对该传媒经常实施战时检查制度,以防这些传媒挑动日裔的反美情绪。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美国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美国华文传媒进行片面解读,认为这些华文传媒的存在,无助于美国价值观在华人的广泛传播,反而进一步凝聚了美国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例如美国学者怀斯等人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上撰文批评华人和华文传媒的“中华文化混凝土情结”,^①渲染华人从事间谍活动,导致主流社会对华人产生严重偏见。原本就存在的种族隔阂,在传媒的炒作下变成了一个中美两国的政治议题。从美国学者对德文传媒、日文传媒,再到华文传媒的研究历史来看,只要美国跟某一个国家发生纠纷,或该国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个国家在美国的后裔及其所创办的传媒便成为美国学者研究的对象,防范的色彩非常浓郁,冷战的思维极其明显,对来自敌对国或非友善国的后裔和传媒的研究存在或多或少的偏见和歧视。如美国纳兹利·奇贝利亚(Nazli Kibria)通过对美籍华裔与韩裔的比较研究,虽然肯定华裔的贡献,但是却更加肯定韩裔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这与美韩同盟和中美关系存在意识形态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②许多研究主题是少数族群及其传媒是否效忠美国,是否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等,在研究过程中渗透了浓郁的美国意识形态,偏离了科学研究的客观公正原则。

2. 缺乏对传媒本身特点的研究。许多研究者对少数族群社区进行了深入调研,也对少数族群传媒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他们的专业背景隶属社会学,对新闻传播学并不十分了解,往往站在主流社会的视角上看待少数族群传媒的生存与发展,认为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同化下,随着少数族群逐步融入美国社会,少数族群传媒将逐渐消失,甚至有些学者断言其不具有生命力。美国学者朱迪斯·布罗(Judith R. Blau)等人认为其生存期限大多不会超过2年。^③然而,实际上,许多少数族群传媒生存时间都超过了2年,如《星岛日报》(1975年8月)、《世界日报》(1976年2月)、《侨报》(1980年)、《国际日报》(1981年)等报纸,至今在美国仍然拥有较强的影响力。罗伯特·帕克预言

^① David Wise, *China's Spies Are Catching Up*,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2011; Joby Warrick and Carrie Johnson, "Chinese Spy Slept in U. S. for 2 Decad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3, 2008; Terry S. Trepper,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ir Immigrant Parents: Conflict, Identity, and Values*, Routledge, July 13, 2000, p. 247.

^② Nazli Kibria, *Becoming Asian American: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and Korean American Identit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July 25, 2003, p. 60.

^③ Judith R. Blau, Mim Thomas, Beverly Newhouse, "Andrew Kavee: Ethnic Buffer Institutions - The Immigrant Press: New York City, 1820 - 1984",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23, no. 3, 1998, pp. 20 - 37.

少数民族传媒将随着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而很快消亡,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正是少数民族传媒不断维护少数民族利益,以传承文化为己任,以及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才使得他们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是仍然能够在长期生存下来。由此可见,美国学者对少数民族传媒的生存与发展过于悲观,结论欠缺客观性。这些悲观的判断反映了学者缺乏对少数民族传媒特点的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学者缺乏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素养。

3. 语言障碍使少数民族传媒研究缺乏创新。许多研究者是出生在美国本土的白人和少数民族新生代。由于他们从小接受美国文化教育,无法深切地触摸到少数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因此研究成果先天就存在客观性和准确性的问题。虽然许多移民到美国的少数民族学者借助通晓本族语言的优势,对少数民族传媒的特点与功能,特别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由于这些研究者大多只通晓两种语言(本族语言和英语),因此对其他少数民族传媒涉及很少,甚至根本无法开展研究。这样,研究只能停留在不断检验前人结论是否正确的层面上,造成研究缺乏创新。此外,由于经费和精力有限,研究者也无法寻求其他族群学者的帮助,翻译其所属的族群传媒的文本资料,以便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即使是翻译过来的文本资料也存在内容是否符合原意以及观点是否客观公正的问题。罗伯特·帕克在19世纪20年代研究少数民族传媒时就曾遇到语言障碍,在对7种少数民族语言报刊的内容进行分析时不得不请多位通晓7种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帮忙,导致其对报刊内容进行分析时存在信度问题。由此来看,要想推动少数民族传媒的理论建构更上一层楼,尽力消除或减少语言阻碍是当务之急。

总而言之,美国学者对少数民族传媒的理论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也对我国的民族研究提供了许多启迪。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相对突出,可借鉴美国学者的研究,促进我国学界对国内少数民族传媒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少数民族的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且有助于造就一个各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文明共享的社会环境。

Abstract American Ethnic Medias (AEM), as means for the promotion of ethnic culture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for maintaining close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provide scholars studying the issue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 identities a new threshold.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 reached by scholars by adopting the related theories in et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conduc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they pointed out that: AEM strategies of localization against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struggle for larger share of discourse power in the society is positive; re-coding and re-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point for AEM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 with the mainstream society; double-ethnicity is not the obstacle to identify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ly, on contrary it may help the ethnic groups to assimilate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he defects of the researches are sorted out such as: too much ideology,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and attentions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both in parallel and vertical not strong enough due to language obstacles.

(彭伟步, 副教授,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州, 510632)

(责任编辑: 罗 薇)